

财经院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GAILUN

主编 辜堪生 副主编 唐晓勇 李学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当今世界,「文化力」愈来愈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我们一方面要吸纳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本书侧重从思想文化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作简明扼要的介绍和评价,帮助读者了解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尚和平等民族精神,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财经院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GAILUN

主编 辜堪生 副主编 唐晓勇 李学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财经院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编委会

主任委员：封希德 王裕国

副主任委员：杨继瑞 刘 灿

委 员：胡良贵 边慧敏 张邦富 毛洪涛
唐晓勇 曾 狄 伍 韧 刘方健
辜堪生 刘大林 杨 丹 高晋康
幸强国（排名不分先后）

序

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西部唯一的财经类全国重点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正快速步入人才培养、科学发展的新时期。

在这个新时期,人类社会的变革前所未见的迅猛、深刻、广泛。以电子信息技术、生命科技和纳米科技为带头学科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地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但归根结底体现在人才特别是高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造就上。在这个新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正在实现或者说已经完成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新时期,西南财大所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我们一直在严肃思考、热烈讨论这样一个重大问题: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取得过卓越成绩的西南财经大学如何更好地发挥作为国家金融、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重要基地的作用?并力求得出一个更为完美的答案。

西南财经大学广大师生在学校党委、行政的带领下,立足自身实际,深入学习、广泛调研了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办学经验,经多轮反复论证,形成了学校“十一五”发展规划,明确了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

大学以人才培养为本,以高素质人才为基。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受制于人才培养模式。为了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必须转换现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设置,塑造具有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合理的知识结构、健全的人格素养的创新型人才,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经过一年多实践和探索,学校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我校特色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即强化通识教育,实施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模式,着力构建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有财经学科特色的专业教育体系。在课程设置上,按“立足学科前沿,加强基础训练,重视综合交叉”的思路,形成了“五

个层级(含公共基础课、文理基础课、大学科基础课、专业主修课、文化素质课)+个性化模块(自由选修课)”的课程结构体系;针对本科一二年级主要修读“两基一文”(含公共基础课、文理基础课、文化素质课)课程,开设人文科学类重点建设的12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逻辑学导论、历史通论、社会学通论、艺术导论、科学技术史、大学物理、大学语文、法学通论、经济学通论、管理学通论、心理学导论。与这一新课程设置体系相配套,学校出台了各专业本科课程修读顺序及学时学分计算等一系列具体规定。新的课程体系逻辑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操作有序、简便、可行。

新模式的实施注重大学生身心素质培养,强调人文与科学的交融、基础与专业的贯通,促进了学生知识、素质、能力的协调发展,为广大学子增强综合素质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全校师生积极参与,热情投入新模式的实践,结出了令人欣慰的初步成果,“财经院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系列教材”的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学校高度重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系列教材的建设工作。编写队伍学术实力强,教学经验丰富,注意吸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关学术研究最新成果,跟踪国际学术发展新动态,力求使教材内容反映当代学术前沿;同时,立足新时期本科教学特点,使学术性、新颖性、可读性有机结合。学校期望通过出版与使用这套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系列教材,达到让学生拓宽视野、扩大知识面、提高人文素养、塑造科学精神的目的,也希望能为我国高等财经院校通识教育及其课程建设做出有益的探索。

是为序。

王裕国

2007年9月4日

目 录

1	第1章 导论
2	1.1 概说“文化”和“文明”
4	1.2 何谓“文化”
10	1.3 中国传统文化
14	1.4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简要历程
16	第2章 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
16	2.1 人类文化与自然地理环境之关系
17	2.2 人类文化产生、形成及发展变化的地理环境因素
20	2.3 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环境因素及其文化特征
24	2.4 农耕地理环境支配下的中国“天下中心”观
28	2.5 古代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文化差异与文化融合
38	第3章 弘扬主体精神的儒家
38	3.1 周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缘起
44	3.2 孔子、孟子与儒家文化的产生
57	3.3 宋明理学与儒家文化的发展

目 录

73	第4章 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
73	4.1 老子:道家文化的创始人
83	4.2 庄子:道家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
90	4.3 黄老之学:道家文化的新形态
93	4.4 魏晋玄学与儒道合流
100	4.5 道教产生与特点
105	第5章 主张超尘绝俗的佛家
105	5.1 佛教的产生、传播及三藏佛典的形成
109	5.2 佛教的基本教义
114	5.3 佛教的宇宙哲学观
116	5.4 佛教传入中国及其演变发展
122	5.5 佛教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
128	5.6 禅宗——中国化佛教的典型
132	5.7 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影响
135	5.8 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与四大名山
138	第6章 宣扬兼爱的墨家与强调功利的法家
138	6.1 宣扬兼爱的墨家
147	6.2 强调功利的法家
162	第7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追求
162	7.1 追求“修齐治平”的儒家“君子人格”

目 录

167	7.2 追求“清静无为”的道家“隐士人格”
172	7.3 追求“建功立业”的法家“英雄人格”
178	7.4 追求“超尘绝俗”的佛家“随缘人格”
184	第8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
184	8.1 人生价值观
187	8.2 自然价值观
191	8.3 道德价值观
195	8.4 经济价值观
200	8.5 审美价值观
205	第9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205	9.1 兼容并包性
208	9.2 非宗教性
213	9.3 泛道德性
221	9.4 内倾性
224	9.5 乡土性
231	第10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231	10.1 天人合一
235	10.2 自强不息
239	10.3 贵和持中
242	10.4 平均平等
244	10.5 人本主义
249	10.6 忧患意识

目 录

252	10.7 达观自信
255	10.8 求是务实
258	参考文献
261	后 记

第1章 导论

在绵亘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贯穿着一种非同凡响的精神内质：在我国广袤的领土上无论何人，在其身上都显示出一种共同的，与社会生活相融合，且互相影响的文化精神。这共同的文化精神形成了我们优良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出自下列七种因素之一：机会、本性、强制、习惯、理性、希望和热情。其实，人之所以作出某一行为主要依其“文化指令”，而“文化指令”主要是人在后天的培养、环境的熏陶下锤炼积累而来的。

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深刻地认识已有的优秀文化，认识我们的民族。正如古希腊人在阿波罗神庙前镌刻的至理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也不管是对于科学还是学说，自我反省都是必需的。通过反省可以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思想、获得新的发展。改革开放给各民族开辟了相互交流、不断拓展的广阔道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应以怎样的姿态同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合作与交流，我们应以怎样的姿态把握自己、表现自己，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真切地把握住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较之把握其皮毛等表层问题要困难得多。不过，民族的不同，致使反映其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也各有差异。我们之所以能从普通人的行为、习惯中辨识各民族的特征，是因为每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都有其独特的一面。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正是我们认识自己、把握中华民族精神、培养和提高各自的文化素养、使我们具有合理的“文化指令”的可靠途径，对我们有诸多裨益。

首先，研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深刻地认识我们当前的国情。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必然有相当长的历史。文化是一个传统，要理解文化也就必须理解什么是传统，二者难以分离。任何有价值和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的记载，即依赖于文字的载体，这些载体多数成为后世的经典，要认识了解文化传统，就不能不认真研读传统的经典及其阐释。新一代的青年学子们既要担负起历史使命，

又要顺应历史的发展，要顺应主流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国情。国情并非空洞之物，其实质就是文化的历史及其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还不尽如人意。虽有数千年的文化遗产，但也带来一定的重负。外来文化有积极的一面，接受尚且不足，其负面影响又在不断扩大。所有这一切不得不让我们深深地思考，不得不使我们由衷地忧虑。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深刻剖析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我们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认清国情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研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端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创造我们美好的未来。任何一种文化，自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它总是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炎黄子孙，理应以理性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去继承传统。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的。”中国文化就是我们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影响中国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传统文化。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和创造机制，有了它社会才得以延续、传承、飞跃，社会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发展。今天，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不能仅滞留于博物馆和故纸堆，还应深入到实践中，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培育我们的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

1.1 概说“文化”和“文明”

“文化”一词并非古已有之。无论是古希腊文字，还是中国的甲骨文中都找不到它的痕迹。虽然文字中无，但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只不过是人类在其时尚不自觉，尚不认识。要认识它、研究它也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期间也曾有过几次大论战，但至今尚无统一意见、统一定义。

在汉语工具书中，“文”和“化”是两个不同的词类。前者为名词，而后者为动词。“文”是一个原创个体字，在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错画也”。《周易》里说：“物相杂，故曰文。”而在其他典籍中又引申为“修饰”（《荀子·儒效》：“取是而文之也。”），“节奏”（《礼记·乐记》：“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美”、“善”（《礼记·乐记》：“礼减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在《周书·谥法》里更是说：“道德博闻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除

“六艺”之外，尊卑序列均可“曰文”。

“化”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天下。”）、“变也”（《庄子·逍遥游》：“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吕氏春秋·顺民》：“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习也”，言指风俗习惯也（《人物志》：“国有俗也”）。归纳起来即是有演进变化之意，从而可以引申出教化、教行、迁善、感染、化育的意义。

“文”与“化”的搭配使用，最早见于《易·贲卦》中的《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天象有“文”（即条理）可循，而人伦也有“文”可循，观察此人文（人间条理），用以教化世人，也即可以平治天下大业。这种“人文化成”的设想，便有别于“神文”倾向的“人文倾向”，也是先哲们对“文化”一词的诠释。

而将“文”与“化”二者合并使用，则始见于西汉末年刘向所著之《说苑·指武》。其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显然将“文”和“武”相对应而有别。《昭明文选》上载有晋束皙所作《补亡诗》：“文化内揖，武功外悠”，显然与之内容相近。而在宗教神性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则有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总之，两千年来，我们的先人都是将“文化”一词来并称“文治”、“教化”的。

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是从日本人对西方术语的使用过程中开始的。日本人用“文化”一词来对译英法文的“Culture”，德文的“Kultur”，而以上各词均来源于由“Colere”演化派生的拉丁词语“Cultura”。拉丁语中“Cultura”具有“耕种”、“培植”、“居住”、“练习”、“留心”、“注意”、“敬神”等诸多含义。16世纪、17世纪欧洲在使用“Culture”过程中由“耕种”等义引申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从重物质生产转向重精神生产。

与“文化”一词意义相近者如“文明”，“文明”中之“文”实指“文采”、“文藻”、“文华”，“明”指“开明”、“明智”、“昌明”、“光明”。“文明”一词首见于《尚书·舜典》之“睿智文明”。按孔颖达的说法，则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他在疏解《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时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和万物，故天下文章而光明也。”在中国古典载籍中也有将“文明”看作一种进步状态来与“野蛮”相对，如李渔《闲情偶寄》中就有“辟草昧而致文明”。唐睿宗李丹也曾用“文明”二字作自己的年号。近代还有“文明戏”、“文明棍”等说法。

用“文明”对译“Civilization”，始于清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郭实腊所编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英文“Civilization”源于“城市”，表示城镇生活的秩序和原则，是与“野蛮”和“不开化”相对的概念。

“文化”与“文明”两词常常混用，如清末的“西洋文明”、“西洋文化”；而将两者加以区分，则始于胡适。胡适 1926 年在其《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将“文明”定义为“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而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显然，他认为“文明”是先于“文化”的。张元济先生则提出“文化是活的，文明是结果”，则“文化”先于“文明”。可见，对二者之关系的认识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1.2 何谓“文化”

尽管“文化”在中西方文献中多有记载，但对其深究探讨并给其定义则是晚近的事。有的学者认为，“文化”的科学概念，只是到了 18 世纪启蒙时代，才真正产生出来。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已不下 200 种。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欧洲人率先摆脱了“神本”和“物本”（即以自然为本）的束缚，开始对人的力量抱有绝对的信心，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了完全肯定的评价。“以人为本”，成为人的自我觉醒和人的解放的根本标志。

无论中西，“文化”从语源和语词内涵的演变上就含有文化是自然的对立物和人类的创造物的意义。这种意义深深植根于物质生产劳动所体现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之中。古代思想家“制天命而用之”、“以人造天”的认识，就是古史传说中的圣王（劳动实践活动中的英雄）总结治理自然、社会经验，并用它来教化百姓，即“以人文化成天下”思想的合逻辑的发展。

《易·贲·象》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自然秩序，“人文”指人事条理，两者并不矛盾。文化来自自然，又区别于自然。古代圣贤明察自然变化，然后把改造自然的经验总结出来，把人类社会管理的经验也总结出来，创造出礼、乐、典章制度，教化民众，流传后世。

《易·系辞传》中的“观象制器论”表达了古代中国人“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文化观。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研究鸟兽草木，近则了解人

身，远则探讨万物，创造了八卦，并以八卦来贯通宇宙万物的神奇变化，观察自然、制作工具。依据八卦的原理，伏羲结绳作网，用来打猎捕鱼，神农氏斫木作耜，并教导人民利用这种农具；黄帝、尧、舜改革变通，创制衣服、舟楫，驯养牛马，发明加工粮食的杵臼和作战的弓箭，创造房屋代替洞穴，研制文字代替结绳而治，从此百官利用文字来处理政治，万民利用文字来考察事物，大体说明了先民如何由观察自然到制作工具，改造自然，取得经验，遗传给后代的历史活动过程，表明人类创造文化脱离野蛮的历史状态。文化是人的产物，为人所创造，古人似乎已经懂得了这一道理。尽管古史传说把功劳归功于圣王，但并没有把圣王塑造成脱离民间生活的上帝，而是与人民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滚在一起的英雄。所以，“文化”含有与自然对立、与野蛮脱离的含义，即开化、教化。这一语义的进一步发展，就使文化含有了知识、教养的意义。

总之，文化是人的生存状态，是人的生存环境，包括社会规范、礼乐制度等。人类生活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不受到文化的影响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人造就了文化，文化也决定了人的存在，决定了人的思维、行为、情感方式。人存在的基础条件是种族、语言、地域、性别、宗教，等等。人类存在于天（宗教）、地（自然）、人（社会）、我（自我情感、自我意识）之间，人的存在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孕育了“文化”的科学概念。到了18世纪，在人文传统深厚的德国，出现了著名的哲学家康德、赫尔德和文学家歌德，依据与中世纪迥然不同的关于人的看法，他们对“文化”作出了划时代的界定。

康德1790年在其名著《判断力批判》中认为，文化乃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有效创造。“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因之我们关于人类有理由来以之归于自然的最终的目的只能是文化。”^①文化的本质在于，主体（人）不断地获得确立一切目的的能力，即不依赖于自然的行动能力。文化是促进人们更加自由的选择，确立并推动目的实现的力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也就是人的社会价值，是人的力量的显现。康德理性主义的文化观，比较重视文化主体改造自然的的活动及其功能。这种文化定义，显然是针对法国启蒙学者把自然看成文化，把自然简化为人的行为的机械主义

①（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5。

的文化观的。康德把道德观念看成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这个看法曾影响了我国学者辜鸿铭和唐君毅等人。辜氏在 20 世纪初出版的《春秋大义》（又译作《中国人的精神》、《原华》）中指出：文化不是房子、不是道路、不是器具、不是制度、不是科学、不是艺术，而是人格，文化的实质就是道德。唐君毅在 20 世纪中期出版的巨著《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以“道德自我”或“道德理性”为中心，论述“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表现”，并建立了道德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体系。

启蒙思想家、文化哲学家赫尔德继承了近代历史哲学奠基人维柯的思想，在巨著《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也肯定了人的本身就是目的。尽管他与康德之间有过争论，但二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人在其理性的和道德的生活中，证明了他自身的存在是正当的。自然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理性的生命，人性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体系不断发展着自身。赫尔德探讨了人、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文化是社会的产物，是人活动的产物，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们活动的重要手段。文化既促进了人，也限制了人。文化和哲学的中心是人的问题。

赫尔德在“狂飙运动”（18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中的同志、《浮士德》的作者歌德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与思想的集体方式，即人类对自然的长期斗争的结果，此集体的思想、感觉、行为的方式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气氛、特殊的美，即是文化。

一般来说，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把文化局限于精神活动领域，在文化史里排斥物质劳动和社会劳动对于文化发展的意义。不过，从赫尔德和歌德的文化观来看，已经有了一些唯物史观的因素。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泰勒 1871 年在其名著《原始文化》里，对“文化”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的意义来说，乃是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 泰勒的定义明确地剔除了人的本能，即生物学遗传或先天性行为，强调了“文化”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获得的，是具有社会性的，超个人的存在，同时说明了“文化”是诸要素的综合体。但是，泰勒的定义仍旧是描述性的，还没有深刻地揭示文化的本质。泰勒的列举是可以无限地添加的，如我们

① 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99—100。

可以把“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列入；泰勒本人在1881年出版的《人类学》中加进了“技术和物质文化”；后来，美国的人类学家奥格本等修订这一定义时补进了“实物”……可见，对于“文化”的界定，不能停留于外在的描述上。

关于“文化”，不少学者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界说。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在《文化的概念》中提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新康德主义者、弗莱堡学派著名代表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提出了价值论的文化定义，他认为“价值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如果把价值和文化对象分开，那么文化对象也就会因此而变成纯粹的自然了”，“不仅应该从价值的观点，而且应当从对文化现象作出评价的那些具有心理的人的观点去考察文化现象”。^①现代著名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其《人论》中提出了符号学的文化定义，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作为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成为人的所有物，而人本身作为它自身符号活动的“结果”则成为文化的主人，文化无非是人的外化、对象化，无非是符号的现实化和具体化，符号和符号功能建立起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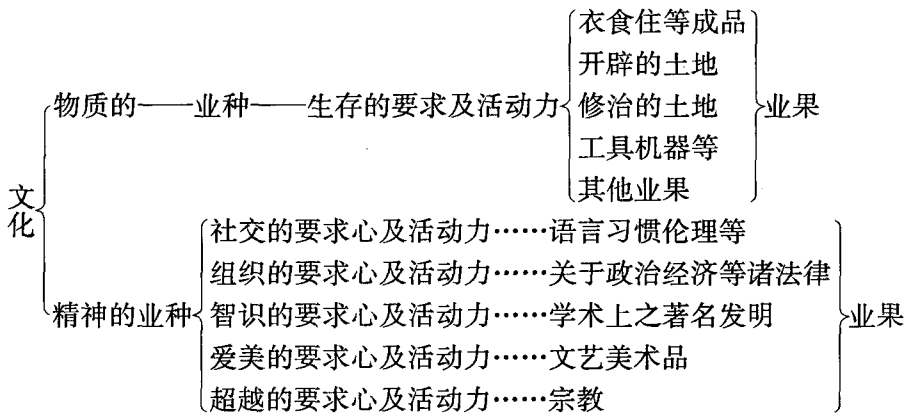
力主实地考察并身体力行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功能性的文化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手段、工具，生活是文化的主体。他在《文化论》里提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如果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文化的功绩。”而美国俄裔人类学家索罗金提出了规范性的文化定义，认为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意识、价值、规范此三者的互动和关联，把文化界定为不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或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强调文化作为人类价值规范的作用。美国现代人类学家格尔兹在其《文化的解释》中指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认识及对生命的态度。”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化”的定义真可以说是“仁

^①（德）李凯尔特.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 [M]. 涂纪亮，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1、25.

者见仁，智者见智”。

20 世纪初，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学者围绕着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碰撞问题，也开始认真研究“文化”的定义和实质。当然，也涉及“文化”的界定。

胡适认为先有文明，而后才有“文化”。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指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而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里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而且，梁启超还列出表格以说明“文化”的内涵，见下表。^①



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目录》中纳入朝代、种族、政治、法律、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居、考工、农事等项。蔡元培在《何谓文化》一文中列举了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科学，指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的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式。”他认为，文化包含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三大领域。梁氏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文化涵盖了人类各民族如何进行生产，其所有器具、技术及相关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教育设施乃至语言、衣食、家庭生活，等等。“全部中国文化是一个整的（至少各部门各方面相联盟）。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②学者黄文山则受功能派的影响，他在《文化学体系》中提出：“文化是人类为着满足生活的需要，凭借语言系统、技术发明、社会祖组织与习

①易鑫鼎. 梁启超文集 [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494、501.

②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0.